

郑观应与毛泽东

盛巽昌

毛泽东早年在湖南韶山家乡时读了很多书，但他那个年代，即二十世纪初期，所读的极大多数的仍是中国传统文化书籍：

一是儒家经典和蒙学读物，如《论语》、《孟子》、《三字经》、《增广贤文》、《千家诗》；二是旧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封神演义》。只有极少量的是当时人写的政治、哲学著作，据毛泽东回忆，也只是两种，一种是一本小册子《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介绍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以及对越南、缅甸宗主权丧失的情景。他说：“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还有一种就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了。

现今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里，还有一张1915年借还《盛世危言》的便条：“詠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泽东敬白。正月十一日。”这是一部八卷本的《盛世危言增订新编》，系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待鹤斋排印本，是毛泽东表兄文詠昌从湘棠阁借来的，然后又为毛泽东借去阅读。这本书和《新民丛报》等，毛泽东很爱读，将它随身携带出了韶山冲，以后又带到长沙，正如他后来对斯诺所说的：这些书我读了又读，直至熟记背诵。

《盛世危言》是郑观应的代表作，是他於早年著作《救时揭要》、《易言》等基础上扩写和充实的。它的初版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推出，后多次翻印，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种书。1907年至1908年之际，少年毛泽东精读了《盛世危言》。他非常赞赏这本书。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盛世危言》开拓了毛泽东的眼界，萌发了爱国思想。三十年后，他仍对这部书念念不忘。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陕西志丹）与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神思逸飞，又回忆起这本书给他的影响。

毛泽东说：（当时父亲）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由于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而败诉。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有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影响。

毛泽东还对埃德加·斯诺说：《盛世危言》激起来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不久，毛泽东走出韶山冲，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

《盛世危言》的主题思想是富强救国。它在1894年问世之时，正是甲午中日战争民族危机严重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运动兴起的时候，因而受到有改革思想的皇帝和张之洞等大臣的欣赏和认同。毛泽东当时所读的《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八卷本），也即是在1895年推出的本本上稍作增订的，它更为迎合时势，着意增加了强化国防，商务和发展经济技术等篇章。但它仍是治标未治本，没有触及到封建主义制度的基础。因此，毛泽东在1947年8月，在陕北沙家店战役结束后，与警卫员闲谈又提及了这本四十年前所读过的本本。他说：小时候看《水浒》，只知道杀富济贫，不懂得反对封建；大点了，看《盛世危言》，以为有了外国的技术、机器和枪炮就行，还是不懂反封建。《盛世危言》这本书唤醒毛泽东重新读书，追求新知识，促使他走出韶山冲到处创业和求学。

（本文作者是上海社科院研究员）